

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崔庆波, 于浩洋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自贸区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提高企业的员工素质、改善企业的劳动资料、拓展企业的劳动对象、优化企业的要素配置,并通过制度创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要素组合优化 4 个维度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和独立性权重进行指标赋权,采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2—2022 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对“区外市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制度成本的路径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在沿海地区显著,但在内陆地区不显著。因此,应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优化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并增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企业新质生产力;融资约束;制度成本;制度型开放

中图分类号:F741.2;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4)06-0001-16

引用格式:崔庆波,于浩洋.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J].西部论坛,2024,34(6):1-16.

CUI Qing-bo, YU Hao-yang.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West Forum, 2024, 34(6): 1-16.

* 收稿日期:2024-06-10;修回日期:2024-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JY117);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专项(YNWR-QNBJ-2020-160);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3YNUZK03);云南大学高端智库培育项目“区域国别研究专项”(2024CY22624204)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崔庆波(1981),男,云南曲靖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Email:cqbmail@126.com。于浩洋(2000),男,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Email:244291064@qq.com。

一、引言

企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主体,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企业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武峥,2024)^[1]。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扩张,增长速度和质量受到传统生产要素规模和结构的限制,难以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卢江等,2024)^[2],因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载体,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且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力水平也差异显著,需要因地制宜地加快各类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各种因素,从而采取适宜的策略持续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以来,大量文献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也不断涌现。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评估、经济社会效应和影响因素3个领域,其中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在企业的内部因素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刘敦虎等,2024;张秀娥等,2024)^[3-4]、人工智能(张轩铭等,2024)^[5]、技术进步(段钢等,2024;张沥幻等,2024)^[6-7]、ESG表现(孙娜等,2024)^[8]、资本配置(田冠军等,2024;王兴强等,2024;杨芳等,2024)^[9-11]等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企业的外部环境方面,除了营商环境(刘德宇等,2024)^[1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姚树洁等,2024)^[13]、金融发展(孙献贞等,2024;张雪兰等,2024)^[14-15]、政府行为(郭檬楠等,2024)^[16]等因素外,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相关政策实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国企改革(齐平等,2024)^[17]、金融政策(李存芳等,2024)^[18]、税收政策(顾振华,2024)^[19]以及各种试点政策,如智慧城市试点(张蕴萍等,2024)^[20]、信息惠民试点(赵斌等,2024)^[21]、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谢家平等,2024)^[22]、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刘家民等,2024)^[23-24]等。

尽管关于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逐渐丰富,但从分析视角来看,大多着眼于国内,鲜有文献探讨对外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当前,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世界经济格局趋于复杂化并加速演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目标、逻辑、功能、价值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佟家栋等,2024)^[25],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徐政等,2024;安淑新,2024)^[26-27]。作为制度型开放的典型代表,自贸试验区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那么,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是否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众多文献探究了自由贸易区及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比如: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刘秉镰等,2018)^[28],推动区内企业高级劳动力素质提升(黄先海等,2021)^[29],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创新发展(崔日明等,2021)^[30];通过创新管理模式、促进供应链优化协同、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壁垒、强化政策激励等路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吕洪燕等,2020;赵家章等,

2023)^[31-32],并助力绿色创新(别奥等,2024;李少林等,2024)^[33-34]和数字经济发展(钟坚等,2024;王喆等,2024)^[35-36]。新近的一些研究关注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刘洪铎等(2024)^[37]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加快了市场制度变革,改善了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了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庆庆(2024)^[38]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推动市场化有效提升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然而还没有文献实证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探讨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优化了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方法。现有研究大多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3个方面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忽略了生产力三要素的优化组合,且大多简单地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虽然可以避免主观判断导致的赋权偏差,但也可能使一些重要的但信息量较少(区分度较弱)的指标权重被低估。本文紧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要素优化组合4个维度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和独立性权重相结合的赋权方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参考。二是从对外开放维度拓展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入认识制度型开放在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揭示了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制度成本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并探讨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外市内”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异质性,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港),在所有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方案中均涵盖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企业创新发展、推动制度创新等内容,这些都将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创新活力、改善提升企业的劳动资料、拓展提升企业的劳动对象,并优化企业的资源要素配置,从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首先,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人才集聚和创新激励效应,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支撑和更有效的创新驱动。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实施的住房补贴、职业发展支持等人才发展政策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进入和集聚,尤其是国际人才和技术的交流合作有利于劳动者接触和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提升企业员工的劳动素养和生产能力(孙红雪等,2023)^[39];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建设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潜能,促使企业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其次,自贸试验区建设将形成制度高地优势,可以有效提高区内资源要素的供给水平和积累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助力企业劳动资料的优化升级;同时,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新模式的促进措施将加速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成果孵化,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改进(崔庆波,2023)^[40]。再次,自贸试验区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不仅要驱动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还要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这将促使企业积极挖掘新的劳动对象以通过开发新产品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并加快劳动对象的提质升级以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巩固和提升市场地位。最后,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有利于企业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比如: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了外资流入流程,降低了投资门槛,可以有效促进资本要素在企业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政府职能的优化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放管服”改革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可以为提供更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有利于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自由流动和企业内的高效组合;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了企业的高水平集聚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有助于企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整合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2. 自贸试验区建设、融资约束缓解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企业的正常运营、技术创新和新项目实施都离不开资金支持,但由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原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不仅限制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也约束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对新质劳动者的吸引和培养。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通常会倾向于通过压缩包括劳动者报酬在内的成本进行内源融资,不利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和研发团队的建设(齐红倩等,2023)^[41]。其次,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对新质劳动资料的投资和使用。资金短缺不仅会迫使企业压缩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投入,阻碍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还会制约企业在新设备、新技术和新模式引进和应用上的资金投入,不利于企业劳动资料的改善。再次,融资约束会阻碍企业对新质劳动对象的拓展和提质升级。企业通过对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适配实现劳动对象的拓展和提质,往往需要有相应的前期投资和持续的财务支持,融资约束不仅会削弱企业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可能导致企业错失利用新劳动对象获取竞争优势的机遇。最后,融资约束除了直接影响单个生产要素的改善提升外,还会影响要素间的配置组合。受限于资金不足,企业难以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优化组合,跨部门、跨领域的生产协同与创新合作也较难实现。

自贸试验区建设则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重要支撑。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会拓展企业的融资渠道,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优化促进了国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等,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企业融资的降本增效(许晨曦等,2023)^[42];通过搭建政府支持平台和投融资服务体系,可以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指导、融资方案设计等全方位服务,有效帮助企业获取政府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提升企业融资效率(王洪亮等,2023)^[43];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用水平和融资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路径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3. 自贸试验区建设、制度成本降低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制度成本是企业运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管理型制度成本和市场型制度成本^①(张桂玲等,2018)^[44]。企业制度成本过高会制约其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制度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培养和吸

^① 管理型制度成本主要在企业进行政策沟通和实施内部管理的过程中产生,是企业为了维持正常运营、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合规性和减少风险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主要包括决策、监督与控制、代理等管理性成本。市场型制度成本是企业为了处理和维系与外部交易主体的关系和推进签约履约而花费的成本,主要包括合约准备成本、签约成本、监督执行成本和合约履行成本,是市场营商环境及其效率的直观体现。

引高素质劳动者。提高员工素质需要企业进行相应的内部管理创新和组织结构调整,而这些管理制度的改革和调适会增加企业的培训成本以及时间和资源投入,从而影响员工培训的效率和规模;企业吸引高素质人才需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职业发展机会,制度成本的增加可能挤占这部分预算,使得企业在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制度成本过高会阻碍企业对新质劳动资料的开发和使用。在市场型制度成本较高时,较高的市场交易壁垒会阻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资料改善,同时也会干扰企业的市场竞争,削弱市场机制对劳动资料改进升级的激励作用。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时,弱产权保护使竞争对手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并使用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动力。再次,制度成本过高会阻碍企业劳动对象的拓展和提质升级。企业劳动对象的拓展和提升往往涉及新的市场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和大数据等),当市场型制度成本较高时,行政审批流程和市场准入限制会延缓相关项目的实施进度,增加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时,过度监管也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导致企业在满足监管要求方面投入过多精力,并使企业更加厌恶风险,减少对新业务、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不利于企业对劳动对象的拓展和提升(刘尚希等,2019)^[45]。最后,制度成本过高也不利于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准入限制和不公平竞争会抑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不仅阻碍企业获取关键技术、人才和资本,增加企业优化要素组合的成本,还可能导致企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从生产性活动转向合规性风险管理,降低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使命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而制度创新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能够同时降低企业的管理型制度成本和市场型制度成本,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自贸试验区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特区模式,由政策红利驱动转向制度红利驱动,通过系统化的制度创新有效简化审批流程、放宽市场准入,从而全面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合规成本(罗舟,2023)^[46]。自贸试验区通过“多规合一”改革、证照分离、单一窗口、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直接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便利化,减少了企业在注册和运营过程中的行政审批环节,使得企业及其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市场,全方位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戴翔等,2024)^[47]。同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激励和制度创新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企业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企业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增强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和市场竞争力(李俊,2023)^[48],进而提高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成本的路径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实证检验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Z_{it} = \alpha + \beta PFTZ_{it} + \eta 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Z_{it})“新质生产力”为 t 年 i 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核心解释变量($PFTZ_{it}$)“自贸试验区”为 t 年 i 企业所在城市是否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变量(处理组虚

拟变量^①与自贸试验区设立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X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u_i 和 u_t 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测度。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和要素优化组合 4 个维度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其中, 对生产力三要素的评价, 参考韩文龙等(2024)^[49]、张秀娥等(2024)^[4]的研究, 新质劳动者主要通过员工素质来体现, 新质生产资料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水平、智能化水平和数字资产水平来反映, 新质劳动对象主要通过研发投入、绿色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来衡量; 对三要素优化组合的评价, 借鉴王方方等(2024)^[50]的思路, 采用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 3 项指标的耦合协调度来衡量。在指标赋权上, 鉴于熵值法基于数据内在特性的赋权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主观判断可能带来的权重偏差, 同时, 考虑到如果某指标与其余指标之间的相似度较低, 应当采用独立性权重以避免低估其影响, 本文参考陈钰芬等(2022)^[51]的方法, 通过熵值法权重和独立性权重的几何平均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进而计算得到样本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指数。此外, 由于指数的数值较小, 在实证分析中对新质生产力指数进行乘以 100 处理后得到“新质生产力”变量。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具体指标	测度方法	权重/%
新质劳动者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6.41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员工人数	9.54
新质劳动资料	技术创新水平	$\ln(\text{企业申请专利数}+1)$	7.24
	绿色技术水平	$\ln(\text{企业申请绿色专利数}+1)$	17.55
	智能化水平	$\ln(\text{智能化水平词频}+1)$	14.43
	数字资产水平	数字化相关资产/无形资产总额	6.58
新质劳动对象	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之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9.03
	绿色化转型	绿色化转型指数	5.15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指数	10.93
要素组合优化	要素耦合协调度	三要素指标的耦合协调度	13.14

注: 参照周阔等(2022)^[52]、韩峰等(2024)^[53]的方法, 利用样本企业年报的文本信息对绿色化转型指数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测算。

(2) 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张秀娥等(2024)^[4]的研究, 选取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一是“资产负债率”, 以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衡量; 二是“股权集中度”, 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 三是“流动资产比率”, 以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 四是“现金比率”, 以现金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 五是“高管

① 本文的处理组样本包括除 2023 年新增的新疆自贸试验区之外的 21 个自贸试验区。其中, 2013 年 8 月, 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 2014 年 12 月, 在天津、广东、福建设立自贸试验区, 涉及天津、深圳、广州、珠海、厦门、福州 6 个城市; 2016 年 8 月, 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设立自贸试验区, 涉及大连、沈阳、营口、舟山、郑州、开封、洛阳、武汉、宜昌、襄阳、成都、泸州、西安、重庆 14 个城市; 2018 年 10 月 16 日, 设立中国(海南)自贸试验区, 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 2019 年 7 月 27 日, 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设立自贸试验区, 涉及济南、青岛、烟台、南京、苏州、连云港、南宁、钦州、崇左、保定、石家庄、唐山、昆明、红河、德宏、哈尔滨、黑河、牡丹江 18 个城市(州); 2020 年 9 月 21 日, 在北京、湖南、安徽设立自贸试验区, 涉及北京、长沙、岳阳、郴州、合肥、芜湖、蚌埠 7 个城市, 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从舟山扩展到杭州、宁波、金华(义乌)。

薪酬比例”,以高管薪酬与薪酬总额之比衡量;六是“营业利润率”,以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

2. 机制检验方法

考虑到传统中介效应模型难以保证中介变量的外生性,存在内生性偏误和统计检验功效偏低等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如下两个计量模型来检验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通过推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制度成本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M_{it} = \alpha + \beta PFTZ_{it} + \eta 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Z_{it} = \alpha + \beta M_{it} + \eta 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M 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选取以下机制变量:一是采用“SA 指数”和“WW 指数”来衡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指数越大则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二是参考刘冰冰和刘戒骄(2023)^[54]的研究,以企业年度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管理型制度成本的代理变量,以企业年度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市场型制度成本的代理变量。为便于分析,采用制度成本的倒数得到机制变量“管理型制度成本”和“市场型制度成本”,其值越大,表明企业的制度成本越低。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12—2022 年。对样本进行如下删选:剔除 ST 和 *ST 类样本,剔除样本期内退市的样本,剔除变量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样本数据主要来自 Wind 数据库,并对连续变量进行双边 1% 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13 885	5.725	3.996	0.049	62.411
核心解释变量	自贸试验区	18 065	0.401	0.490	0	1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18 065	0.433	0.201	0.008	0.998
	股权集中度	16 369	0.576	0.151	0.092	0.973
	流动资产比率	18 065	0.577	0.199	0.017	1
	现金比率	18 063	0.008	0.016	0.000	0.705
	高管薪酬比例	14 077	0.003	0.005	0	0.155
	营业利润率	18 065	0.001	0.003	-0.090	0.140
	SA 指数	15 878	-0.263	0.019	-0.417	-0.188
机制变量	WW 指数	13 582	-1.033	0.173	-12.067	-0.722
	管理型制度成本	18 046	2.710	0.744	0.036	7.235
	市场型制度成本	17 958	3.301	1.369	0.045	13.222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基准回归

应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其进行检验。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Z_{it} = \alpha + \sum_{j=-M}^N \delta_j PFTZ_{c,t-j} + \eta X_{it} + \mu_i + \mu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PFTZ_{c,t-j}$ 为政策虚拟变量,如果城市 c 在 $t-j$ 期间设立了自贸试验区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M 和 N 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和政策实施后的周期数。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图 1。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同时, 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两年之后, 政策效应显著为正, 初步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后的前两年, 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说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性, 这是因为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新政策的推出及实际落地需要一定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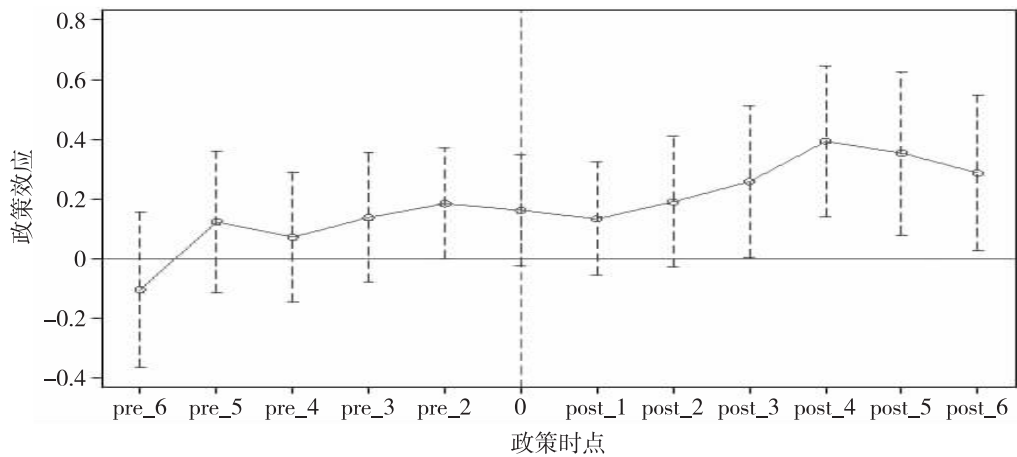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3 为基准回归结果。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始终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假说 1 得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自贸试验区	0.233*** (3.60)	0.240*** (3.71)	0.237*** (3.67)	0.226*** (3.50)	0.245*** (3.82)	0.385*** (5.90)	0.365*** (5.64)
资产负债率		-0.975*** (-4.88)	-1.156*** (-5.71)	-1.277*** (-6.27)	-0.782*** (-3.83)	-0.630*** (-3.06)	-1.086*** (-5.23)
股权集中度			-1.464*** (-5.32)	-1.346*** (-4.88)	-1.519*** (-5.56)	-0.871*** (-3.16)	-0.676** (-2.47)
流动资产比率				-1.132*** (-5.14)	-1.765*** (-7.93)	-1.658*** (-7.47)	-1.553*** (-7.04)
现金比率					16.687*** (14.96)	14.318*** (13.33)	14.076*** (13.21)
高管薪酬比例						227.129*** (26.03)	225.599*** (26.06)

续表 3

变 量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营业利润率							-98.408 *** (-12.27)
常数	5.279 *** (183.66)	5.683 *** (64.87)	6.598 *** (34.20)	7.241 *** (31.51)	7.354 *** (32.29)	6.414 *** (27.39)	6.525 *** (28.07)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626	13 626	13 626	13 626	13 626	10 913	10 913
调整后 R ²	0.770	0.771	0.771	0.772	0.776	0.816	0.77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下表同。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基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出海港口和沿边口岸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节点,自贸试验区依托港口及口岸通道,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同时,成熟的港口体系和口岸通道意味着更高的物流效率和更低的运输成本,可以更好支撑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城市与港口或口岸的距离越近,则其对外开放条件越优越,越有可能率先成为自贸试验区。基于此,本文采用城市与港口或口岸之间的距离构造工具变量,一方面该距离与是否设立自贸试验区具有一定相关性,另一方面其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具体来讲,采用样本城市质心到最近港口或口岸距离^①的自然对数值的倒数与时间趋势变量的交乘项作为“自贸试验区”的工具变量,再进行 2SLS 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 Panel A。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与自贸试验区选址相关。Anderson LM 统计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F 检验值远超 Stock-Yogo weak ID test 在 10%水平上临界值 16.38,表明工具变量是外生有效的,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拟合的“自贸试验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结论依然成立。

(2) 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样本优化(见表 4 的 Panel B)。第一,考虑到海南自贸试验区的范围覆盖全省,面积和定位都与其他自贸试验区存在显著不同,剔除海南自贸试验区样本后重新进行基准模型检验;第二,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城市在经济体量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且具有较强的政策偏向性和发展特殊性,剔除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四个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基准模型检验;第三,考虑到自贸试验区建设存在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政策效应在较短时间内可能并不显著,剔除 2020 年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样本后重新进行基准模型检验。二是控制行业固定效应(见表 4 的 Panel C)。考虑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可能与其所属行业的特征相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后重新进行检验。三是

^① 运用 Arcgis 软件计算得到各城市的几何质心点,通过百度地图工具计算城市质心点与离该城市最近的港口或口岸之间的直线距离。

控制其他政策影响(见表4的Panel D)。考虑到国家级新区也是重要的开发开放平台,其中大量城市与自贸试验区重叠,且成立时间普遍早于自贸试验区,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国家级新区的政策变量后重新进行检验。上述检验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4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工具变量法		Panel B:样本优化			Panel C:	Panel D:
	第一阶段 自贸试验区	第二阶段 新质生产力	删除海南 试验区样本	删除新设立 试验区样本	删除直辖市 样本	控制行业 固定效应	控制其他 政策影响
自贸试验区		0.365*** (3.21)	0.361*** (5.67)	0.281*** (3.86)	0.247*** (3.58)	0.341*** (5.31)	0.365*** (5.65)
工具变量	7.688*** (66.56)						
国家级新区							-0.063 (-0.43)
Anderson LM	3526.957***						
F 值	168.9						
10% maximal IV size	16.38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10 913	10 913	10 847	8 530	8 450	10 912	10 913
调整后 R ²			0.826	0.805	0.821	0.823	0.819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此外,考虑到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因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而产生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借鉴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55]的研究思路,通过Stata软件中的twowayfweights命令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在所有4 951个权重中,3 837个权重为正,1 114个权重为负,正权重之和为1.170 7,负权重之和为-0.170 7,负权重占比较小,这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弱。

3. 影响机制检验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从缓解融资约束机制来看(Panel A):“自贸试验区”对“SA指数”和“WW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SA指数”和“WW指数”对“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对其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降低制度成本机制来看(Panel B):“自贸试验区”对“管理型制度成本”和“市场型制度成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成本;“管理型制度成本”和“市场型制度成本”对“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制度成本的降低对其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制度成本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本文提出的假说2和假说3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缓解融资约束路径			
	SA 指数	WW 指数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自贸试验区	0.0004 ^{***} (3.15)	0.019 ^{**} (2.68)		
SA 指数			12.671 ^{***} (2.64)	
WW 指数				0.239 ^{**} (2.17)
观测值	12 272	10 592	10 913	9 312
调整后 R ²	0.967	0.187	0.819	0.813
变 量	Panel B:降低制度成本路径			
	管理型制度成本	市场型制度成本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自贸试验区	0.022 ^{**} (2.11)	0.031 ^{**} (2.00)		
管理型制度成本			0.188 ^{***} (3.11)	
市场型制度成本				3.079 ^{***} (3.22)
观测值	12 641	12 359	10 912	10 634
调整后 R ²	0.831	0.886	0.819	0.819

五、进一步讨论

1.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外市内”企业的影响

前文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然而其中有部分企业并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即存在“区外市内”的企业,那么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显著提升这部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从理论上讲,自贸试验区作为扩大开放的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服务和融入各类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也承载着重要使命。因此,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很有可能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即不仅能够推动区内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以带动区外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通常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而溢出效应的最先受益者往往是“区外市内”企业。对此,本文进一步检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外市内”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将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矢量边界数据与样本企业经纬度坐标数据进行匹配,准确识别出位于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内的企业,并删除这部分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的Panel A。“自贸试验区”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外市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2.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需要执行和服务国家战略,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上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导致其对制度创新的敏感度较低;另一方面,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专用性较强,转型成本高、阻力大,导致其转型升级的自主性灵活性不足。这些都会制约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创新对其产生作用的发挥。此外,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制度成本降低效应来看,非国有企业通常会面临比国有企业更高的融资约束,同时往往会因缺乏应对复杂行政程序的资源和经验而在制度成本方面承受更大的压力,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和行政便利化及监管优化等措施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降低其制度成本;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本身具有融资优势,加上政府背景和资源获取优势导致其对制度成本变化的敏感度较低,因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和制度成本的降低程度较弱。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国有企业。对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的Panel B。在“非国有企业”组“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组“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但对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预期相符。

(2) 区域异质性。我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由沿海向内陆不断扩展延伸的梯度推进策略,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外向度较高,各微观经济主体对开放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和对国内市场波动的适应力也较高,较易实现从市场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型升级,因而沿海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有更好的制度创新基础,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推进更为顺畅,政策效应的产生也可能更快更充分。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与沿海地区还有一定差距,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产业基础和制度基础相对薄弱,制度创新的落地实施也可能存在较多阻碍,因而内陆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效应可能相对较弱。对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两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的Panel C。在“沿海地区”组“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内陆地区”组“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沿海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内陆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充分显现,这也与理论预期相符。

表6 溢出效应与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Panel A:溢出效应	Panel B:产权性质异质性		Panel C:区域异质性	
	“区外市内”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自贸试验区	0.281 ** (1.91)	0.532 *** (6.11)	0.133 (1.62)	0.395 *** (4.99)	0.205 (1.16)
观测值	10 274	7 156	3 607	8 213	2 697
调整后 R ²	0.817	0.814	0.856	0.819	0.808

六、结论与启示

自贸试验区既是制度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深度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平台,这种双向协同的制度型开放,有利于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适应性调整,为生产力的创新与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从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要素组合优化4个维度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2年的数据检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结果表明:(1)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和建设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改善企业的劳动资料、拓展提升企业的劳动对象、优化企业的资源要素配置,从而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2)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而融资约束缓解、制度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制度成本的路径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3)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外市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比国有企业,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各自贸试验区应立足自身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目标定位,通过全面深化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高端产业集群,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基础,持续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加速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第二,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优化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加快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应更加聚焦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科技创新,不断完善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沿海自贸试验区的示范作用,不断增强内陆沿边地区自贸试验区的特色优势;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为不同自贸试验区开展差异化探索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不同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制度创新。第三,增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自贸试验区的平台优势带动各类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制度创新中,应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避免短期化和碎片化,循序渐进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武峰.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2): 20-28+148.
- [2] 卢江,郭子昂,王煜萍.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3): 1-17.
- [3] 刘敦虎,易敏轩,唐国强,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机理研究[J/OL]. 软科学, 1-19(2024-11-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41031.1635.002.html>.
- [4] 张秀娥,王卫,于泳波. 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OL]. 科学学研究, 1-19(2024-05-21).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40518.003>.
- [5] 张轩铭,田甜. 人工智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劳动力结构调整和要素增益技术变迁的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 46(9): 89-99.
- [6] 段钢,刘贤铤,闫伟男.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4, 44(15): 38-50.
- [7] 张沥幻,张金昌. 数实技术融合、企业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20): 1-12.
- [8] 孙娜,曲卫华. “双碳”目标下ESG表现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4, 39(10): 24-41.

- [9] 田冠军,李尚明,陈余,等.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新质生产力[J]. 证券市场导报,2024(11):37-48.
- [10] 王兴强,黄欣婷,韩振家,等. 无形资产融资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专利质押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会计之友,2024(20):144-153.
- [11] 杨芳,张和平,孙晴晴,等. 耐心资本何以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J/OL]. 西部论坛,1-17(2024-09-3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00.C.20240930.1000.002.html>.
- [12] 刘德宇,王珂凡. 营商环境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J]. 金融与经济,2024(8):85-94.
- [13] 姚树洁,蒋艺翅. 数字基础设施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理论与实证[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12.
- [14] 孙献贞,李言,高雨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新质生产力[J]. 兰州学刊,2024(7):54-67.
- [15] 张雪兰,王剑,徐子尧,等. 惟精惟勤,玉汝于成:信贷专业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24,39(5):3-21.
- [16] 郭檬楠,王彤,杜亚光.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财政部门预算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J/OL]. 财经论丛,1-11(2024-11-13). <https://doi.org/10.13762/j.cnki.cjlc.20241113.002>.
- [17] 齐平,刘佩瑶.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6):1-11.
- [18] 李存芳,庄甲荣,王文虎,等. 绿色信贷政策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系统效应[J]. 资源科学,2024,46(10):1930-1943.
- [19] 顾振华.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分析[J]. 税收经济研究,2024,29(5):70-83.
- [20] 张蕴萍,王潇凯,陈言. 智慧城市建设对培育发展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8(2024-11-1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41114.1858.002.html>.
- [21] 赵斌,汪克亮,刘家民. 政府数字化治理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证据[J]. 电子政务,2024(9):38-49.
- [22] 谢家平,郑颖珊,董旗. 供应链数智化建设赋能制造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4,26(5):15-29.
- [23] 刘家民,马晓钰. 数智化创新政策如何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J]. 西部论坛,2024,34(4):17-34.
- [24] 刘家民,马晓钰. 大数据发展能否催生出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 金融与经济,2024(7):1-13.
- [25] 佟家栋,于博. 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必要性、一致性与实现路径[J]. 国际经济合作,2024,40(4):1-7+91.
- [26] 徐政,牟春伟.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四链”融合视角[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3):74-83.
- [27] 安淑新. 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OL]. 当代经济管理,1-10(2024-10-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41021.1600.002.html>.
- [28] 刘秉镰,王钺. 自贸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准实验的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9):65-74.
- [29] 黄先海,喻盼,宋学印.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基于自贸区边界内外上市公司数据的微观实证[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6):23-32.
- [30] 崔日明,陈永胜,李丹. 自贸试验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力机制与空间带动效应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21(11):1-20.
- [31] 吕洪燕,孙喜峰,齐秀辉. 制度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J]. 软科学,2020,34(10):76-83.
- [32] 赵家章,苏二豆,施苏娜.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是否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 [J]. 学习与探索,2023(10):115-126+2.
- [33] 别奥,杨上广. 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经验证据[J]. 国际商

- 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4):71-88.
- [34] 李少林,邵东旭,薛寒忆.碳排放双控效果评估与绿色创新机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证据[J/OL].环境科学,1-19(2024-05-31).<https://doi.org/10.13227/j.hjxx.202404021>.
- [35] 钟坚,冯峥.制度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企业集聚: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24(9):3-17+135.
- [36] 王喆,余紫菱,马莉莉.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4,40(1):131-135.
- [37] 刘洪铎,王梦飞,徐雨欣,等.制度型开放、营商环境改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4,39(5):4-22.
- [38] 陈庆庆.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视角[J].新疆社会科学,2024(5):15-73+181.
- [39] 孙红雪,朱金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否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基于多种创新要素集聚的中介机制检验[J].现代经济探讨,2023(11):72-84.
- [40] 崔庆波.边疆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发展的逻辑、成效与趋向[J].云南社会科学,2023(1):60-70.
- [41] 齐红倩,张佳馨,陈苗.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23(10):23-40.
- [42] 许晨曦,牛志伟,董启琛.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改革,2023(2):139-154.
- [43] 王洪亮,颜国强.自贸区设立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吗?——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20(3):92-101.
- [44] 张桂玲,郭飞,郭慧敏.制度成本对“内贵外贱”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0(10):1-16.
- [45] 刘尚希,王志刚,程瑜,等.降成本:2019年的调查与分析[J].财政研究,2019(11):3-16.
- [46] 罗舟.创新支持政策下自贸试验区企业多阶段研发投资动态决策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44(6):94-99.
- [47] 戴翔,马皓巍.制度创新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了吗[J].国际贸易问题,2024(1):16-31.
- [48] 李俊.自贸试验区数字贸易发展十年探索与未来展望[J].人民论坛,2023(20):60-64.
- [49]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6):5-25.
- [50] 王方方,涂先青,杨智晨,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估与时空格局分析——基于“先进性—发展潜力—实现水平”的三维测算[J].西部论坛,2024,34(4):1-16.
- [51] 陈钰芬,范嵩盈.区域知识创新水平的测度逻辑及比较[J].统计研究,2022,39(10):34-50.
- [52] 周阔,王瑞新,陶云清,等.企业绿色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科学,2022,35(6):56-69.
- [53] 韩峰,黄敏,姜竹青.企业数字化、网络地位与污染减排[J].世界经济,2024(2):204-232.
- [54] 刘冰冰,刘戒骄.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管理,2023,45(6):62-78.
- [55] CHAISEMARTIN C D, D'HAULTFOEUILLE X.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9):2964-2996.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I Qing-bo, YU Hao-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Institute of Free Trade Zone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Pilot free trade zones serve as the forefron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deeply integ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his two-way synergistic institutional openness is conducive to accurately adapting to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adaptive adjustments, it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uses listed company data from the Wind database from 2012 to 2022, constructs a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factors of productivity, determines the index weight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independence weight, calculat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vel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onstruction on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enhance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pilot free trade zones mai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alleviat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ing corporate institutional co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pilot free trade zones have a more pronounced promotional effect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n the coastal area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t the role of inland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s in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s not limited to enterprises within the zone,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tend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t optimizes the measur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losely follow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ptimizes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new quality laborers, new quality labor objects, and new quality means of labor, and considers the optimization indicators of new quality factor combinations, constructing an index system that better fit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 using listed company data, it is the first to empirically tes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i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rd, it reveal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an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alleviat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ing corporate institutional costs, analyz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policy system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institutional opennes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reating a pioneer area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assisting in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levels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pilot free trade zones;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stitutional cost;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CLC number: F741.2; F2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4)06-0001-16

(编辑:夏冬;刘仁芳)